

达命令占领日本租界外围沿线，以确保租界，预防万一……”旋接北京武官永津中佐来电称：“天津暴动系以张璧等为主的河北自治维持会一派所策动，已破坏杨村铁桥并已占领天津中国地区各要地，正计划等待韩复榘之到来……”等等。

11月9日夜，土肥原再次来电称：“天津暴乱实为溥仪出走剧的一幕。因进行中发生差错，杨元吉未能及时来津，又加经费不足，因而遭受挫折。”

但是，溥仪与土肥原会面后决定逃往满洲，11月11日由塘沽出发，在营口上陆，终于踏上满洲的土地。

当时天津、北平甚至南京的中国报纸，对土肥原投以监视的眼光，屡屡报道土肥原大佐在天津的活动情况。土肥原和天津日军惟恐坐失良机，竟不顾关东军司令官前述指令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完成了溥仪出走工作。

（摘自《土肥原秘录》）

为配合溥仪出走而制造天津暴动

土肥原

土肥原被派往天津准备挟持溥仪

“关于迎接溥仪的问题，首先是在板垣和石原等之间谈起的。我在大约一个半月以后辞去奉天市长，被派前往天津，目的是为了在天津发起一场暴动。这场暴动是潘燕七和李际春等人搞的。我知道他们在石友三失败之后，想再制造一次动乱，所以企图利用他们一举颠覆华北，并趁兵荒马乱之际，将溥仪由

天津带出。但害怕国内的币原外相不愿溥仪出走，桑原领事也对此戒备森严。”

“我从张勋革命时期即与皇帝相识，因此前往会见皇帝就赴满问题进行商谈。皇帝曾提出种种条件，我回答说：‘现在不论接受什么条件，问题是日后形势如何变化尚难预料。主要是决心问题，当前一切取决于您的决心。’事后我和郑孝胥长子郑谦会面，进行商谈。郑谦谈到关于逃走的计划，我指出那样不行。然后我在工藤铁太郎（后由皇帝授名为工藤忠）和大谷猛两位浪人的陪伴下和三浦忠次郎少佐参谋进行了洽商，决定伺机行事。”

“第一次天津事变就是这样发动的。时间大约是 11 日。翌日就使溥仪搭乘淡路丸前往营口。当时天津驻军仅有一个大队左右，由于人数不足，又抽调了巡警，从而将保护溥仪住宅的巡警亦均派往肇事现场，趁此时机使溥仪逃走。”

“当时币原外相慑于外国的干涉，甚至发出如发现溥仪逃走即或击毙亦无妨碍的训令，因此不得不乘乱逃走。此次事变，陈觉生等中国方面人士很有功劳，应予酬谢。第二次天津事变是第一次事变的继续。我表面上佯作出差赴津，事发后被关东军召回，受到南大将的叱责。”

“以后，我转任哈尔滨机关长。苏联表面上不加干涉，暗中却进行阻挠。为了使第二师团由长春进驻哈尔滨，我和大桥总领事与苏方进行了交涉，并和现任外交部大臣的李绍庚也进行了谈判。此时，冯涵清表现积极，后成为该市市长。没有一个日本人遭受杀害，主要由于冯背叛了对方，投向我方，且背叛了王瑞华警察署长所致。以上是在围城中所进行的工作情况。冯涵清因此被张学良抓捕入狱，后由我军释放出狱，派往哈尔滨加以利用，且以该人有功，选任为该市市长。”

关于土肥原机关长的主要活动，大致如上所述。为了便于读者了解，以下附加说明。

事变前夕的天津机关长

1930年4月以来，中央政府首领蒋介石与西北派的冯玉祥、阎锡山对抗，一直处于交战状态。张学良乘虚而入，以劝告停战、和平调解为名，于9月中旬率7万奉军进关，后来张学良在北平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。

进入1931年后，奉军为了压制逐渐抬头的反张运动，进一步增强了进关的兵力，至事变爆发前夕，已达到十一万五千多人。就在这时，1931年3月，土肥原领导的特务机关宣告诞生。

（摘自《土肥原秘录》）

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亲历记

刘家鸾

1931年，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任河北省主席，驻天津，我担任第二军参谋长。这年10月下旬，王树常从北平开会回来，召集所属军警负责人开会。王说：“日本人占了东北，还想向关内推进，他们现在采取以中国人打倒中国人的办法，利用一些流氓、地痞在各地进行骚扰破坏活动。我这次在北平听说，日本人在天津准备组织便衣队起事，自今日起我们要加紧戒备。”当时我们在天津可以使用的兵力，主要是公安局保安大队，虽然不是正规军队，但枪械齐备，训练有素。总队长是王一民。由于《辛丑条约》的关系，天津市内的驻兵受到限制，第